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 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中国史学会 金冲及

各位学者，各位嘉宾：

中国史学会和云南大学联合举办的“21 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了。

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次讨论会呢？

会议的主题是“21 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当然不是说要在本次会上预测 21 世纪内中国历史学将会怎样具体发展，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如刚进入 20 世纪时人们不可能预想到今天中国历史学的现状一样。会议确定这个主题，主要是想在我们刚刚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一起来对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应该怎样发展，共同交换一下意见。

进入 21 世纪，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周围一切的变化实在太快太大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两极对峙的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国正努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这一切，对我们的社会结构、生活状况、人们的需要和关注的问题以至思维方式等等，都将带来以前想像不到的深刻变化。

江泽民同志最近两次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和“五点希望”。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类进入剧烈而深刻变化的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历史学应该怎样发展，也遇到许多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大概是我们每个从事史学工作的学者都在思考的。正因为许多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大家难免会存在一些困惑或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

比如，新中国的历史学应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没有疑问的。大家也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标签，而是探寻真理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封闭的学派，总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那么，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不是简单化地以至教条式地去理解和对待它？

比如，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无疑需要从人类一切文化成果，包括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中吸取有益的营养。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非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科学方面研究成果和方法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举一个例：摩尔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古代社会》，对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展的巨大影响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以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又继续有许多科学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值得我们吸取。这些年，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后，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的交流将更加深入，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将会带来更大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积极地对待这种局面？同时，毋庸讳言，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也出现一些简单地照抄照搬、对历史事实不是下功夫进行具体分析而是硬套到某些现成的理论中去的现象。对这些现象，我们又应该怎样以积极的态度正确地对待？

比如，中国是一个具有特别悠久的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的东西。罗素曾经盛赞过“东方的智慧”。那么，在前人留下的丰富的史学遗产中究竟有哪些优良的东西，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中断或丧失？

比如，历史学有它特殊的社会功能：既要看重当前，又要顾及长远；既能直接地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又能帮助人们增长智慧，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事物，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这两个方面中，哪一个方面都不能被忽略，都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发挥它在这两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比如，在新的世纪里，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历史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应该怎样创新？

再如，学风问题在当前历史学发展中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对青年史学工作的健康成长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大家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这些也是史学界的朋友经常谈到的重要话题。去年举行的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上，还提到专和博，充分掌握可靠的原始材料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关系等问题。那么，当前中国史学界在学风上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来培育良好的学风，促进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健康成长，把中国的史学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如此等等。这里只是举例，应该说到的问题肯定还有很多。

这类问题都是大家所共同关心的，希望能够像谈心一样相互交换意见。可惜，以往很少这样的场合。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史学界一次难得的盛会。到会的学者，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几乎涵盖史学领域各大学科，有受到大家尊敬的老学者，有已经取得重大学术成果的中年学者，也有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比较年轻的学者。这样多学者不远万里，聚集昆明，对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自在地交换意见，实在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在过去可能还不曾有过。据我所知，很多学者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珍惜这个机会，放下手头的重要工作来参加会议，有些学者还是改变了自己的原定议程或者取消了原来准备参加的

活动而来的。

会议准备先由齐世荣教授、林甘泉研究员、张海鹏研究员、贺圣达教授、王文光教授五位学者作大会发言，随后分几个组进行讨论。小组讨论的原则，就是前面所说的“自由自在地交换意见”只要觉得是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都可以谈，没有预设的框框，在范围上也不受限制，只是对发言时间请适当控制一下，以便使更多的学者有发言的机会。最后的大会发言有两项内容：一是请各组介绍一下本组讨论的内容，如果对某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分别加以介绍；二是由每个组再推一两位学者讲讲他们在小组中发言的内容，以便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交流。

这次讨论会不准备作什么结论，也不可能作什么结论。许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很多学者从会上提出的问题中受到启发，在以后还会进一步思考。在新世纪之初举行这样一次会，无非是开一个头罢了。

云南大学对这次会议的举行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做出巨大的努力，等于已经把一个舞台搭好，各个学者可以在这个台上自由唱戏。我想代表中国史学会和与会学者向云南大学和会议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在“21 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晏友琼

尊敬的金冲及会长、各位专家、学者：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今天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国历史学界的七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汇集一堂，回顾 20 世纪中国史学走过的历程，畅谈当今国内外史学发展趋势，商议 21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计，展望中国史学的前景，这是中国史学界跨入新世纪后的一次盛会，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向前来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热烈的欢迎！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在这块红土地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民族有 26 个，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化；云南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百七十多万年前元的元谋人揭开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序幕；云南与祖国内地有着悠久的密切联系，与祖国的发展和命运息息相关。自从庄蹻入滇，来自祖国各地先后进入云南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云南、建设云南，创造了云南绚丽多彩的文化；云南也是祖国与世界交流往来的通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从这里通向东南亚、南亚，远及世界各地。近代以来，云南成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守卫着祖国西南边疆门户，并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贡献力量。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第一枪在这里打响，闻一多怒斥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呐喊从这里发出。新中国建立后，云南各族人民在保卫边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发展文化事业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当前，云南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认真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实施中央的“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贯彻实施省七次党代会精神，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云南努力奋斗。

根据云南省的省情和区位，总结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在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下，云南省委提出了云南省的发展目标，这就是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绿色经济强省”和“连结通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通道”。我们认为，要实施这个发展战略，既需要云南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全国的支持，既需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实干，也离不开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从云南省实际情况来看，历史学科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次全国史学界的著名专家、学

者在昆明聚会，必将有力地推动我省历史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将为我省实施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连结通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提供宝贵的启示和借鉴。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期望会议取得预期的成果。

云南大学是我省最早建立的高等院校，到明年它将迎来建校 80 周年。近 80 年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云南大学为云南的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科研成果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是“科教兴滇”的一支重要力量。“九五期间”，省委、省政府重点支持云南大学，使之成为云南省进入国家“211 工程”建设的惟一的高校。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一期建设顺利完成，通过验收。省委和省政府决定支持云南大学进入二期建设，加大投入，在继续建设民族学和高原生态与生物资源学两个一期建设的重点学科的同时，再遴选几个具有优势和特色，与云南省社会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学科重点建设，其中就包括历史学科。

历史学科是云南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几代学者在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在唐宋经济史、中国民族史、南亚东南亚研究、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等领域成果显著，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但是，与内地学校和研究单位相比，也还存在明显的差距。省委、省政府希望参加会议的云南大学、我省各高校、科研机构的历史学者充分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认真地回顾和总结以往的经验，虚心向中国史学会和外省的专家学者学习，探讨我省历史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 and 道路，推动我省历史学科的发展，提升学术水平，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实施省委、省政府的发展战略做出新的贡献。

云南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省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云南人民是好客的。昆明四时如春，五月的昆明春意更浓，彩云如画，繁花似锦，气候宜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会余和会后到云南各地多走走，多看看，领略云南美丽的自然风光，体验云南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同时也希望对云南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云南大学是联合主办单位之一，也是东道主，要做好会议的服务工作，让各位专家带走对昆明、对云南的美好回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祝新世纪中国史学兴旺繁荣！

祝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事业进步！

谢谢！

在“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 ” 开幕式上的讲话

云南大学 高发元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5 月的昆明，艳阳高照，百花绽放，满眼苍翠。在这美好的季节里，由中国史学会和云南大学联合举办的“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 ”今天开幕了，我代表云南大学向应邀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历史记录着人类文明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是意识形态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了解历史可以知事，认识历史可以明理，研究历史可以启智。历史对于人和人所组成的社会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成为能够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门科学。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留给后人丰富的历史资料、实物、现象去发掘、整理、认识和研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相适应，对历史的研究也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产生了大量丰硕的成果，对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研究历史有着久远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但直到 20 世纪，特别是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对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的理论、内容、方法、手段和学科体系的认识才逐步深化和完善。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史学界的众多前辈和中青年专家学者已经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科进行了全面或专题性的总结与回顾，意义重大。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应当广泛借鉴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有可能解决。在新的世纪，历史科学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将会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因此，对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进行展望就显得非常的迫切。今天，我国历史学界各学科领域最知名的大部分专家在金冲及会长的率领下云聚于春城昆明，共商中国史学在 21 世纪发展的大计，这实在是我国史学界的一次盛会，必将在中国历史科学发展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次史学盛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也给云南大学的史学工作者和历史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对我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承担培养历史学专门人才和进行历史学研究任务的高校，云南大学历史学科是我国历史学教学、科研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借此机会，我向各位专家、学者和来宾

简要介绍云南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情况，请大家指正。

云南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始于 20 世纪初。1923 年云南大学建校伊始，就已有学者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1937 年，成立文史系，下设中国文学、史学两个组。其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国内许多著名高校纷纷南迁来昆，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昆联合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一时间，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昆明高校云集，大师荟萃，昆明也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这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云南大学历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小石、楚图南、徐嘉瑞、顾颉刚、白寿彝、钱穆、向达、吴晗、华岗、尚钺、姜亮夫等，曾先后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极大地提升了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学术条件，使云南大学历史学在开创初期便处于一个较高的起点，并直接融入到中国的学术体系之中，奠定了深厚的底蕴。

新中国建立，云南大学历史学的发展步入了一个重要时期。1951 年，历史学科从云南大学文史系中分离出来，正式建立了历史系。1955 年，周恩来总理到云南大学视察，针对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特点，指示“要根据云南的特点，着重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特别要研究少数民族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贡献”。依据周总理的指示，云南大学历史系组建了民族史教研室，1961 年创办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方国瑜、江应樑、杨堃、尤中等先生开出了一批民族史和地方史的课程，编写了有关的教材和讲义，并组织力量着手编撰大型史料巨著《云南史料丛刊》等。经济史方面，李埏先生开出了“唐宋经济史”，编写了唐宋经济史和中国封建经济史的讲义。世界史方面，除有学者研究欧美史外，在我国世界中世纪史、阿拉伯史专家纳忠先生的倡导和努力下，于历史系设了阿拉伯史专门化课程，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阿拉伯史专门人才。同时，一批学者致力于亚洲各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其他诸如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史学理论等学科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历史学的发展既出现了多学科齐头并进的局面，又体现出了自身的特色。

“文革”十年，我国的学术和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云南大学历史学也不例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很多教师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这不仅延续了历史学教学和研究传统，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云南大学的历史学科迎来了更加辉煌的发展时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学校先后建立了一批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1978—1984 年间，先后建立了云南地方史研究室、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西南古籍研究所。

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和学科学位点建设工作也得到了发展。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云南大学就招收培养了多名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文革”十年，这项工作中断。1980 年，中国民族史和专门史（经济史）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1981 年，在国家首批学位点评审工作中，中国民族史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专门史（经济史）获硕士学位授权。1982 年，世界地区史、国别史获硕士学位授权。1986 年，专门史（经济史）获博士学位授权。以这些学位授权点为依托，80 年代以来还招收培养了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中国近现代史等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时，选送多名教师

到山东大学攻读史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历史学学科的发展，不仅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和颇具规模的历史教学和科研队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而且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为支持云南大学历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986年，云南省政府将中国民族史和中国经济史列为首批省级重点学科加以支持和建设。经过“七五”期间的建设和发展，经有关方面评审，这两个学科已迈入全国先进行列。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云南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又迎来新的机遇。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对全国部分博士点、硕士点进行检查评估，中国民族史、专门史（经济史）两个学科专业点均被评定为A，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学科专业点被评定为B+。1995年初，历史学由原国家教委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这既是对云南大学历史学科建设和建设成绩的肯定，也使我们面临新的发展压力。为进一步推进历史学科的发展，学校及时将历史学科的建设纳入云南大学“211工程”“九五”建设规划之中，加以重点支持。1996年以来，我们进一步整合校内力量和资源，并加大了引进人才的力度，完善了历史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目前，全校从事历史学教学和研究人员达到一百余人。专业领域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等多个学科。2000年，新增中国少数民族史、世界史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新建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和亚非研究中心，进一步完善了学科支撑体系。同时，大力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全面学分制，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一条龙的人才培养体系。与此相适应，狠抓特色课程建设。“非洲文化史”课程于1997年荣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民族史”等一批课程获省级教学优秀成果奖。科研方面突出精品意识，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云南大学历史学科从草创到现在已近80年。80年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弹指一挥间，而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却饱含着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历史学已经成为云南大学最具规模和实力最强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目前，历史学科共有历史学、世界史两个本科专业，拥有专门史、中国少数民族史、世界史三个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一个国家级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有品种齐全、数量较多的专业图书资料中心和设备较为先进的多媒体教室、电子阅览室等支撑条件，形成了较完整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体系。在2001年教育部组织的对全国历史学基地的评估验收中，云南大学历史学基地被评为优秀。

特色是学科的活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总结云南大学历史学科80年来的历程，我们所走过的是一条发展特色学科的道路。

——中国民族史是云南大学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学术传统的优势学科方向之一。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区，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世居民族就有25个。在云南开展民族史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也产生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老一辈学者的开拓下，民族史研究形成了以西南民族史为重点，融中华民族发展史为一体的研究体系。同时，民族史研究

的开展，还带动了西南地方史、历史文献学等专业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是在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的带动下形成的一个优势特色学科方向。方国瑜、尤中等老一辈学者，既从事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又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老一代学者的开拓带领下，一批中青年学者迅速成长，踵事增华，形成了一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该学科方向以西南历史地理和边疆史地的研究为重点，融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

——中国经济史是在李埏等老一辈学者的开拓下发展起来的又一优势特色学科方向。该学科立足唐宋经济史，以中国商品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为主线，对中国经济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研究内容涉及唐宋经济史、中国商品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经济地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及云南地方经济史。

——亚非史是新发展起来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优势特色学科方向。云南紧邻东南亚、南亚，研究东南亚、南亚历史具有优越的地缘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点加强了对东南亚、南亚历史的研究，并选择了非洲史作为新的领域。目前，亚非史已形成了以研究世界上后进国家的历史为主，兼顾欧美史的学术体系。

以上四个学科方向为支撑，历史学科构建起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风格，形成了重点带动一般、多学科方向联动发展的局面。

云南大学历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还表现在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上。从1983年起，历史系先后增设过档案、图书馆、人类学、社会工作专业，后来以这些专业为依托分别建立3个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以历史学学科的队伍为重要支撑，民族学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连续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级重点学科和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门科学。它以其“鉴古知今”的特殊功能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泽东、邓小平，都反复论述了历史学的重要性。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同志致信白寿彝先生，祝贺他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时强调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培养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这充分说明了历史学的重要性。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忽视历史学的倾向，有的院校甚至撤消了历史系。云南大学则始终极为重视历史学科的发展，将其放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科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对待。历任校领导都亲自抓历史学学科的建设，定期研究历史学的发展问题，在全校范围内整合教学和科研的人员力量，在人财物方面给予重点支持，积极创造各种有利于历史学科发展的条件。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从学校实际出发，我们进一步明

了历史学科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云南大学与全国许多重点高校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从综合实力来说，不可能拿“全能冠军”，但是，可以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去争取“单项冠军”。根据我校“立足边疆，服务云南，办出特色”的办学思路，突出特色，以特色体现水平，以特色求发展为着力点，在全面发展各二级学科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了中国民族史、历史地理学、中国经济史、亚非史四大支柱，既有“点”又带动了“面”的发展。

面对新的形势，要办好历史学科，做好这篇大文章，还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思路、办学观念、办学机制进行改革。在教学方面，推行了全面学分制，并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科研方面，突出精品意识，集中攻关，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管理方面，树立了围绕学科建设服务的意识，进行奖励和分配制度改革，使历史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

云南大学虽地处边疆，但不能仅限于办出“边疆水平”，必须在全国学术平台乃至国际学术界参与竞争。学术交流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从 1983 年以来的 20 年间，云南大学组织或承办了诸如秦汉史、唐史、宋史、土地制度史以及民族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世界史等十余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既锻炼和培养了队伍，又扩大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在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数代学人勤奋耕耘，认真钻研，撰写和发表了较为丰硕的学术科研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每年均有 4—5 部专著出版，年均发表的论文上百篇。历史系编辑出版了专业刊物《史学论丛》共 8 辑。许多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1995 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江应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方国瑜、尤中、朱惠荣参与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尤中的《云南民族史》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此外，李埏等人撰写和主编的《宋金楮币史系年》、《中国土地国有制史》吕昭义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刘鸿武的《非洲文化史》等都先后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许洁明的《英国社会史》则被教育部列为 2002 年向全国推荐的重点教材。

回顾过去 80 年，我们无比振奋，展望 21 世纪，我们信心倍增。我们对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将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大的支持。目前，我们已将历史学科的建设列入云南大学“211 工程”二期建设规划之中，并作为备选国家级重点学科加以重点建设。

最后，我要向长期以来在云南大学历史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给予指导、帮助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历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

首都师范大学 宁可

有一种感觉，近些年来，有些史学家好像不大提到马克思主义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看成是一种固定的框架，一种僵化的模式，一种教条式的东西。不是以它为指导去研究历史的实际，而是拿它去硬套历史的实际。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而在以它为指导去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又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尤其是在面对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时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对人们实践活动的一种理论概括，也是对人们科学成果的一种总结。它不仅要从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还应当不断汲取各种学说的精华，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但过去有些人不这么看，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亘古不变的教条，到处去套。不仅如此，还把它的一些观点夸大化、片面化、绝对化到荒谬的程度，还要拿这种荒谬的东西当棍子去打人。马克思主义讲阶级，讲阶级关系，讲阶级矛盾，讲阶级斗争。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不能把阶级社会的一切现象、关系、事物、思想都归之于阶级关系；即使是阶级关系、阶级思想，也有强有弱，有显有暗；阶级关系也并非都是阶级对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不都是暴力、革命、武装斗争。什么都是阶级，到处都是斗争，到处乱贴标签，到处乱打棍子，只能把社会引向崩溃，因为它是反科学的；也只能把历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因为它正是反历史的。一些歪嘴和尚念经，把好好的经文糟蹋了，还要祭起这种糟经来打人，动不动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其责任不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但由此而引起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困惑、怀疑乃至排拒，也就不难理解了。

还听到一种说法，说历史研究要排除意识形态的束缚或干扰，或者说不需要什么意识形态。在这里，意识形态似乎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乃至过去所谓的“无产阶级政治”。我想，意识形态是一种成体系的思想，韦伯也好，萨特也好，海德格尔也好，乃至后现代思潮等等，恐怕都称得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难道我们要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么？任何一门学科，总是要有它的理论的。有人说，具体的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者具体的细小的问题即所谓“微观”问题的研究，不需要理论。但是，只要是稍微复杂一点的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者综合性的陈述，都可以看到在材料的取舍，分量的轻重，陈述的方式等等方面上，某种历史观点或理论的作用，所谓“微观”的研究也是如此。在这里，理论的作用可能淡薄、间接，但也不好说一定没有。至少，研究方向的取

向，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的采用，都要受某种思潮、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的影响，尽管有些研究者自己并不清楚，并不自觉，也许只是赶热点，乘大流。乾嘉之学的形成恐怕是当时学者对清初文化高压政策的一种回应，也是对成为官学的理学末流的一种反抗，而其研究的态度与方法，也不能说没有一种像“实事求是”这样的思想或观点的指引。“文革”刚过，有一些说法如“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历史与政治脱钩”等，就是对过去那种荒谬的、歪曲篡改历史的“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影射史学”的一种纠正和逆反，其实也是对历史学的任务和功能的一种认识，一种观点，一种理论。

任何学科包括历史学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问题在于是哪一种理论指导。理论的指导作用不是自封的，要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更要在实践中检验，不断地检验，这里也包括各种理论的和竞争。不能说理论是干扰，或某种理论是干扰。至于什么理论对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有用，那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整体的基本的认识，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经受了实践的检验的，如：社会历史中的种种因素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是一种复杂的网络、结构、系统。其中，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社会存在中，人们的经济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又是最基本的，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能说，一切社会因素、社会活动都来自生产，也不能说，一切社会因素都是由生产决定的，经济以外的因素、作用也是很大的，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一种场合，往往还起到决定的作用。但是就社会的整体而言，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言，经济终究是最基础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活动本就十分复杂，而活动着的人的思想意识尤其复杂多变。因此在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中，无穷无尽的偶然性构成了历史的表象。然而，无穷无尽的偶然性的总体，它们的聚合、碰撞、增生、加强、削弱、提速、趋缓、爆发、湮灭等等，都体现了历史深层的规律性。历史终究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不能看做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线性关系，它也许并不能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物，但却显示了一种曲折多变的发展趋向。

这样的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历史学的对象是客观历史，它的基本任务是求真，就是要认识那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即达到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一致，主客观的一致。它的其他种种社会功能如教育、借鉴等，只能也只应当在“求真”的基础和前提下去实现。这种认识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这不仅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多变，还由于认识主体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而必然是以自己的意识去能动地反映历史，因此在认识过程中就不易正确反映客观的真正的历史。更由于历史已成过去，不复再现，也不能重构，我们只能通过史料去认识历史，因此我们的历史认识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接近真实的摹写。但我们应当努力使之接近客观存在的历史，而不是相反。有人赞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里突出了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主导作用，但不应当是用主体的思想去创作历史。有人赞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里突出了新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对历史认识前进的作用，但新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应当促使我们去更深更广更高地认识历史，而不是以当代人的认识去改造客观历史。还有一种说法，历史的研究可以分成两截。对

历史事实的认定要准确，是科学，而历史的内涵、精神的探讨则是主观的发挥，是文学、艺术或者哲学什么的，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对历史的深层、内涵、精神的探索，思想、理论乃至想像的作用更大，然而这终究是为了发掘深层、真实、内涵的真象，不能用主观的东西去代替它，不能用虚拟的东西去改变它。这种发掘，仍是科学，探求客观、绝对尊重客观的科学，从实际出发而又回到实际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是这种探求最好的指引。还有一种说法，客观历史是不能认识的，也无需乎认识，要研究的是关于历史的知识，关于历史的“文本”和“话语”。研究客观历史的一大困难是我们并不能直接接触历史，即使有亲历这样的直接经验，那也是极短和极局部的。我们认识历史几乎几乎要全靠史料这样的“文本”和“话语”，没有史料，我们的历史认识几乎无法进行。但是，对已有的历史知识的认识，对史料的认识，只能说是历史认识的开始而决非它的终结。我们终究是为了探寻那过去的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史料学、史学史、史学思想史，乃至诠释史学、历史哲学、历史美学、历史文学等等终究不好替代历史科学吧。

还有一个方法问题。辩证法是事物运动的规律，也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辩证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马克思曾概括为三条，列宁提出了十六条，但没有封口，又突出了对立面的统一，斯大林提了四条，毛泽东则突出了矛盾问题。我们应当领会它的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不能作教条式的理解，尤其不能作片面化、形式化、绝对化、极端化的理解。讲对立，就不讲统一；讲对立，就只讲对抗；讲对抗，就只讲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讲相互转化，就只讲突变、爆发；不看还有另外的方面，不看时间地点条件。这样，就成了阶级斗争为纲，一切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事事讲了。这是对辩证法的极大的违背。

照我的理解，辩证法是一种基本的总体的方法。它并不排斥其他的科学方法，好些科学方法其实是辩证法基本精神或者某些方面的一种深化、精确化和具体化，一种发展。像系统的方法，照我的理解，就是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规律的一种深化、量化、数学化，而它能成立并且成功地运用，照系统论创始者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着重了事物的结构、系统、功能及其运动，而抽去了这些事物的性质问题。但是，要整个地理解事物及其运动或者其他方面，性质问题恐怕还是不能排除在外的。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它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绝不是要排斥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正像我们不应盲目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我们也不要盲目地接受随便哪一种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而应当经过分析，吸收它的科学的、精华的部分，来丰富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论素养，提高和加强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探寻真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的能力。

我相信，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理论，看待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为指导来从事我们的历史研究，是可以提高我们历史认识的能力和水平，是在在求真的道路上前进，是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科学，是可以使我们的研究能够更多更好地经受实践的检验的。

关于当前历史科学的几点浅见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张磊

各位专家，各位新老朋友，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把自己关于新世纪史学发展的瞻望的浅见跟大家汇报一下，希望大家多指教。我想简单地谈几个问题：

第一，历史学面临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 90 年代之初，历史科学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有的学者发出“危机”的喟叹。但近年来几次史学会议气氛有所变化，比如 1998 年在扬州召开的史学会气氛就很好，接下来我们组织的几次会议，总的趋势也是好的。但是，现在的史学研究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历史学经常被忽视，出现学科被消弭、取代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这种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大学历史系已不复存在，有的大学历史系与旅游结合，我觉得后者虽然是一种方式，但不是很恰当。历史可以为旅游服务，但过于急功近利就不算一门科学了。一些地方社科研究机构也有类似情况。以我所在单位为例，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在 1986 年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建立了孙中山研究所，当时省委和有关部门都很支持。但是现在机构要压缩，各人文所就要合并，因为很多人认为人文科学是“软件”，可有可无，所以把文学所与哲学所合并成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所和孙中山所合二为一。这种状态，还是院领导作了很大努力才争取到的。人们都为人文精神的沉落而忧虑。

我们面临的这种比较低迷的气氛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对历史学的认识问题。江泽民总书记近一年多来关于社会科学的几次重要讲话，包括 1998 年前给上海市社科院、上海市社科联、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题词中的精神，并没有被很多各级干部深切领会与掌握。有的同志仅在口头上讲讲，并没有真正落实，有的领导由于对我们的学科了解不够，对历史科学缺乏重视。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这样的策略：只要人还在，心不死，就要坚持下去，淡泊名利，锲而不舍。当年，我们开始作孙中山研究的时候也是白手起家，虽然没有任何名义（如研究室），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第二，历史科学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我们的事业不可能不要历史科学。特别是一个大党领导一个大的国家，更不能轻视历史科学。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很重视历史科学。历史科学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功能。主要原因有三点：

1. 历史科学探寻社会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规律，大到社会形态、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规律，具体到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展示的规律。历史科学归根结底就是要揭示规律，而不是仅仅限于史料的堆积和史实的考订。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就是在历史规律基础上形成的结论和信念。

2. 我们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科学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对传统文化的分析、批判、继承，必须通过历史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科学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只有通过历史科学，才能判断历史上哪些是消极的，哪些是积极的，有否价值和价值大小。我认为，“继承”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批判，必须要批判才能科学地继承和发扬。批判就有分析的含义，对传统的东西不加分析的继承只能是囫囵吞枣，良莠不分。继承我们的优秀传统、优秀文化，离不开历史科学。比如，近代广东在改革开放方面是开风气之先的，经过分析后才能知道哪些思想是值得继承的，哪些实践是可以肯定的。

3. 历史科学担当着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设置和教材编写的指导作用，并成为主要内涵。这种社会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例和生动的人物才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爱国主义和变革、革命传统继承和发扬。近几年来，强调弘扬优秀传统，加强教育基地建设，比如广州陆续恢复了大元帅府旧址，黄花岗烈士陵园将要建立一个近 2000 平方米的博物馆。史学家在这里就很有作用，大有用武之地。

上述的主要功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不认为历史科学繁荣的出路就要为旅游或是某些具体工作服务。历史科学为现实服务，无疑是这门学科的生命力的标志之一。我们多年从事的孙中山研究，就成为同台湾学者交流的主要课题。但我想最根本的任务，还是探求规律、继承传统的分析功能和爱国主义、革命优秀传统教育的载体。这三种功能是最重要的。当然，历史科学应当尽力为现实服务、更为广泛地发挥自身的特长，并与媒体等行业联姻，但要防范庸俗化。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专业要有信心，不管怎样风吹雨打，起伏跌宕，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历史科学也一定会有发展。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尽管这二十多年来有过一些曲折和顿挫，但历史科学的发展还是相当快速和健康的。

第三，关于历史学科的定位问题。

如上所述，我觉得历史科学的总体定位是很明确的。但是从战略和操作上的定位，则要根据实际。十多年前，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社科规划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社科队伍是值得信赖的，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的。他们在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历史科学定位问题，从功能、队伍方面也已经明确。历史科学是社会科学中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部分。一个民族如果不重视历史是不可想像的。胡乔木同志曾经讲过：如果对中国历史不甚了了，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中国人。全世界的文明国家、发达国家大都重视历史。例如，美国几乎每个市镇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尽管他们的经济水平我们不能比，但是这种重视是可以理解和借鉴的。只要我们经济、文化发展，历史科学就一定会发展。历史科学本身有明确的定位，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基础。

但是，在历史科学的功能和定位问题上，可否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无直接

化为生产力的功能。这个问题曾讨论了很久，未获共识。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即大部分社会科学不可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来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历史科学更是这样。所以历史科学定位是中心问题，更要明确社会功能，我们就能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

第四，近代史研究的展望。

正如很多同志都提到的，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正在时序下移。过去集中精力研究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课题，现在看来继续取得突破很困难。因为这些课题研究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再有突破确实不易。有些困难则是由于课题涉及了一些敏感的现实问题，如广东召开的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学者们就相当谨慎，因为触及到太平天国与邪教的问题。所以民国史必然成为我们研究的重头戏之一。另外，一些已开拓的新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社会风习等也是今后近代史研究的新的方向。近代史研究的内容必然下移与拓展，尽管做出很多很突出的成果还需要时间。

第五，史学研究的两种偏向。

其一，轻视理论研究的偏向。历史科学是离不开史实的，个案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史料的考订和个案研究不能代替理论研究，更忌流于繁琐。对这两个方面，都应该给它以宽松的环境，让它健康发展。理论研究的确比较困难，宏观研究也是如此。但这关乎到导向、指导思想，关乎到学科的发展。所以，不能掉以轻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又要与时俱进。既要重视宏观研究，也要防止泛泛而论。比如，孙中山有没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民生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想的关系等理论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二，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噪音”值得关注。我们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噪音”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且不讲它是错误的，起码不是“乐音”，则是许多论者的一致看法。比如最近有位广东学者在香港（明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认为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违法，是一场闹剧，提出袁世凯和黎元洪才是合法总统，而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非常国会都是违法的。作者忽略了任何革命都是违反了现行的法统、法律，这类观点是不足取的。一位历史学家，总要站在民族、人民的立场上。对待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不予扩散，批评和争论都限于学术刊物，一登报就成了免费宣传，反而扩大了他的影响。

这类“噪音”也进入了文艺领域，一些影视作品任意篡改历史。比如近来某大电视台在拍一部关于孙中山的多集电视连续剧。据闻剧本扬“袁”贬“孙”，即表扬袁世凯，贬责孙中山。这样的问题不能忽视，误导的社会影响难以估计。

总之，我们肩负的任务非常重大，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多做贡献！

多元化与历史学的发展趋向

湖南师范大学 李育民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着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作为研究这一发展过程的历史学，也同样存在这一辩证关系。从检视历史学的内在趋势这一角度而言，将这种多样性称为多元化似更为恰当，历史本身和历史学的发展，都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多元化的特征。由于较多注重历史的统一性与学科的独立和完整，历史学独有的多元化特点往往未引起重视。当经历 20 世纪的辉煌，历史学迈入新的世纪之际，探讨其多元化特征，无疑有助于把握其学科特性及其发展趋向，本文拟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

历史学博大精深，涵盖着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由于其本身固有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历史学应该是多元化的。

历史学这一特点，是历史本身决定的。历史是人类已经发生的所有事情，这些事情纷繁复杂，本身就呈现出多元的格局。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又有思想的、文化的。从社会实体来看，包括国家、民族、家族、家庭，及其各种社会组织。这些虽然相互之间存在着联系，但也具有某种独立性。显然，如果要揭示人类过去的万千景象，那么历史学的任务就不应该是单调的，或仅仅注重人类过去的某一侧面。历史学从各个不同的视角，从各种不同的方向去再现、解析人类的过去，便注定了它本身的多元特性。

这一多元特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历史学本身的历史，也展现了这样一个趋向。20 世纪以前，中外历史学均有共同的特点，即研究内容囿于政治和显赫人物，研究地域为本国本民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活动的狭窄，社会生活的单调，以及随之而来人们的思维为国家权力等所制约，未能真正认识历史本身。在中国，学术研究的落后，妨碍了人们对各个领域的认识。在西方，当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发展起来之后，则由于学科的分工，更加强了侧重政治的倾向。由于“作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阵地的高等院校是按系分科组成的，每个文科系（即各个学科）都要求在有关人的研究中分得一块特定领地，这使史学必须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